

目 录

概说	(1)
第一章 经济表现:从“穷城”到“富足”	(4)
第一节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	(7)
一、兴修水利:内整湖塘,外筑海塘	(7)
二、发展农业:垦辟耕地,多种经营	(14)
第二节 手工生产 全面兴起	(22)
一、制瓷业	(22)
二、造船业	(24)
三、制盐业	(25)
四、酿造业	(27)
五、纺织业等	(28)
第三节 商贸兴隆 物货丰衍	(29)
一、定点专卖、行贩和集市交易	(29)
二、世所瞩目的对外贸易	(34)
第二章 学术思想:从佛学兴盛到新儒学开辟	(41)
第一节 开拓一家教观:知礼的天台宗佛教哲学思想	(42)
一、“性具三千”的实相论	(43)
二、“妄心观”的观心论	(45)
三、角立、相即的辩证认识思想	(48)
四、别理随缘的判教思想	(49)
第二节 开辟儒林草昧:“杨杜五子”的儒学思想	(51)
第三节 罗适、舒亶、丰稷等人的体用之学	(59)
一、经史研究与道德实践	(61)
二、学达诸政与达练治事	(67)

第四节 北学初传甬上	(72)
一、陈瓘与《四明尊尧集》	(72)
二、晁说之与《易玄星纪谱》	(76)
第三章 文学艺术:从文星寥落到群贤并起	(79)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诗文	(80)
一、宋初至康定时期的宁波诗文	(81)
二、庆历至元丰时期的宁波诗文	(96)
第二节 北宋后期的诗文	(104)
一、宋哲宗时期的宁波诗文	(104)
二、北宋末期的宁波诗文	(113)
第三节 舒亶与四明词坛	(126)
一、舒亶以外诸家词概述	(126)
二、舒亶词的内容与艺术	(128)
第四节 诗酒宴集与酬唱之风	(136)
一、诗酒宴集	(136)
二、唱和之风	(137)
三、意义评价	(142)
第五节 传说故事的新收获	(145)
一、梁祝故事的新发展	(145)
二、海洋历险故事的新收获	(147)
第四章 科技成就:究之消息,得其准的	(149)
第一节 格物园艺有专著	(150)
第二节 海洋学上出佳绩	(154)
一、燕肃的潮汐学研究	(154)
二、制盐技术	(156)
三、造船技术	(158)
四、航海技术	(160)
第三节 医卫事业多进步	(162)
一、积极推进医药知识的普及	(162)
二、明州开始涌现名医	(163)
三、在药物研究、栽培、管理、销售等方面的进展	(165)
四、公共卫生意识明显提高	(166)





五、北宋宁波与国外的医药交流	(167)
第四节 巧构奇筑见匠心	(167)
一、木筑巧构——保国寺大殿的建造	(168)
二、石堰巧构——它山堰堰体增修的非等厚布置方式	(173)
三、机械巧构——公共计时器的设置	(174)
第五章 文教事业：从“古风久凋零”到化为邹鲁乡	(175)
第一节 “益盛以大”的教育事业	(176)
一、庆历以前四明教育的初兴	(176)
二、庆历以来王安石等地方官的兴学活动	(179)
三、庆历五先生确立了甬上的教化和师道	(182)
四、明州兴学的深远意义	(196)
五、汪洙和训蒙读物《神童诗》	(200)
第二节 图书编纂、校勘、刊刻和度藏	(202)
一、类书编纂	(202)
二、图书校勘与编目	(203)
三、地志编修	(204)
四、图书刻印	(206)
五、图书度藏	(207)
第六章 宗教信仰：处处见弘化，蔚然成佛国	(213)
第一节 明州佛教繁荣状况概观	(214)
第二节 天台宗：从中兴到弘教的演变	(219)
一、宝云义通在明州的传法活动	(220)
二、知礼与山外派的论争	(221)
三、遵式对天台忏法的发展	(223)
四、知礼法系的后续发展	(229)
第三节 净土宗：以台净双修为发展主轴	(234)
一、知礼对台净双修的贡献	(234)
二、遵式对净土的弘扬	(237)
三、山家派后学对净土的弘传	(240)
第四节 禅宗：由云门宗向临济宗递嬗	(241)
一、雪窦重显与云门宗的中兴	(241)
二、临济宗黄龙、杨歧派僧人在明州	(250)

第五节 华严宗和律宗	(253)
一、华严宗:传播无力	(253)
二、律宗:衰而尚整	(255)
第六节 观音信仰的普及	(257)
第七节 文人士大夫与佛教	(260)
一、鄞令王安石与佛教	(261)
二、明州籍居士与佛教	(262)
三、晁说之、陈瓘、黄龟年与佛教	(270)
第七章 社会生活:从“民物鲜欢娱”到丰富多样化	(272)
第一节 “山川作佳趣”的游观	(273)
一、山水风景的营造和游观	(273)
二、四明佛寺的游观活动	(279)
三、综合性游观	(281)
四、境外宦游	(283)
第二节 “利物以济众”的义风	(284)
一、生活性慈善活动列举	(287)
二、公益性慈善活动列举	(291)
第三节 “光彩生顾盼”的饮食	(295)
一、主食和副食	(295)
二、茶饮	(302)
三、宴饮	(308)
第四节 丧葬荐亡仪式	(311)
第五节 民间信仰	(316)
第八章 对外交流:梯航纷绝徼,商通远国多	(325)
第一节 明州与日本:以僧侣为主体的民间文化往来	(326)
第二节 明州与高丽:使团与僧侣的络绎往还	(331)
一、使团络绎	(331)
二、佛教传承	(333)
三、文学交流	(335)
参考文献	(337)
后记	(343)





北宋宁波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除了后来的建炎之乱使宁波遭受酷烈的打击之外，几乎没有出现过危害严重的骚乱局面。故储国秀在《宁海县赋》中曾夸耀说：“且夫自有邑里以来，希见兵革之事……晏然炳葛之居民，真若仙佛之乐地”^①。这虽然说的只是宁海一县，但也完全适用于整个四明地区。在发展、安定的环境下，跨出相对封闭而又落后的世界，以儒家的文化改造原有文化的原始蛮性，建立起贴近时代而又独具自我的文化，是北宋宁波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一建构新型文化的历史进程大约始于庆历时期。

约自庆历始，宁波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官员们集中力量兴修水利，发展农商，尤其是鄞县，经过王安石的治理后，奠定了加速发展的基础。北宋时宁波经济的亮点是商品化倾向有加速的迹象，不但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商品化动向，而且手工业的发展更加全面化，愈来愈多、品种丰富的手工业品进入交换领域，商业交通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宁波与邻近地区经济的联系更为加强。“富足”的经济表现，使社会所能承受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并唤起和激发了市民的闲适和游乐意识，从而使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较大改观。

与之相联系，北宋的宁波文化出现历史性的转轨，即由精致的佛学转向稚拙的儒学。庆历之前，沿着唐代佛教文化发展的惯性运动，四明佛学进入成熟时期，四明一跃成为一个全国佛教的中心地区，天台宗以延庆寺为基地、云门宗以雪窦寺为基地，均获得了中兴，推动了全国佛

^① [清] 光绪《宁海县志》卷20。

教的发展。特别是知礼在佛教哲学上的成就，整个北宋的四明学者无人能望其项背。约从庆历开始四明的学风出现了新变，佛教义学消歇而逐渐转向实践，同时由一群移民的后裔发起的明州新儒学运动逐渐展开。杨杜五子得王安石等官员之助，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倡导实用之学，开辟了浙东儒林草昧。但不可否认，杨杜五子及其后学并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在理论上的创发不多。不过尚处于草昧状态的宁波儒学却自具特色，表现在强调利济、笃实的品格，并有了心学的萌芽。杨杜五子最早主动切入中原儒学的精髓，可以说是宋代儒学地域化进程中明州新儒学的发端。绍兴十八年（1148）高闾作《重建九经堂记》写道：“按旧图牒，其地滨海，狃于霸政，前此声教未被，固非有邹鲁儒风、晋郑人物著见于世。”^①就是说宋以前宁波这块地方还未开化，宁波的儒风之盛是从宋朝开始的，确实如此。在五先生的陶成下，后学在研经治史之外，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也有所涉猎，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流学术文化形态，其意义非同寻常。不过，南北儒学的地域化进程虽然差不多同时开始，但因于江南原有儒学基础的薄弱，当浙东儒学尚未整合成体系之时，北方儒学以其强盛的发展势头形成了地域分野，高势能的北学通过各种途径流向江南，这仍为北学之陆续传入甬上提供了条件。

与学术的转型相联系，北宋宁波的儒学教育绩效可圈可点。通过杨杜五子的努力和高素质官员的垂范，宁波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人才群体开始形成，并通过科举途径成批走上政坛。人物是区域文化在不同时段的重要标志，方志人物的入传，一般强调的是突出性，以便于读者借此把握本地域文化的进程以及识别本地域文化在全国文化地图中的大致坐标，故我们可以从方志入传“人物”的视角略窥北宋宁波文化地位的变迁。在《宝庆四明志》中，入传的唐代人物仅4人，后来同治《鄞县志》的编纂者曾慨叹地说：“唐代人物寥寥无多”，^②这当是唐代宁波文化比较低下的实况的真实反映；《宝庆四明志》入传的北宋人物则多达20人以上，其增长的效率是相当高的，明显地反映了自唐至宋宁波文化资本的积累速率。如果没有教育上的良好成绩，北宋宁波人才的成群出现是难以做到的。在“人才高地效应”的拉动下，

① [元]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8。

② [清] 同治《鄞县志》卷26《人物传一》。



北宋时的宁波精英逐渐化解了边缘意识，教育也使社会秩序由“无法”逐渐走向“有法”。特别是科举为宁波人才的成长创造了大好的机会，受教育者通过科举走入仕途，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又反过来通过教育的方式着力保持家族的文化优势，这样北宋宁波开始初步崛起了一批文化型家族，如楼、王、舒、丰、周等，并形成了因师缘、地缘、家族而形成的人才共生效应以及以家族为依托的血缘型人才链，构成了支撑本地域文化的亮丽景观，这也是宁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北宋时期宁波的对外辐射能力也明显增强，通过宁波港进行的对日、对朝的经济文化交流更见声势和规模。

第一章

经济表现：从『穷城』到『富足』



约皇祐之年（1049）王安石为官鄞县令时作《鄞县西亭》，诗云：“窃食穷城度两年。”^① 这里的“穷城”包含有地方偏僻、经济不富裕的意思在内。王安石在《上运使孙司谏书》中更明确描述说：“鄞于州为大邑，某为县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出，州县百须，又出于其家。”^② 鄞县这种状况的存在，既与长期水利不治、连年遭旱灾有极大关系，也与文化落后、思想保守密切相关。

庆历以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四明地方官员超越传统思维，积极有为，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努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使四明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舒亶诗称甬上“家家人富足，击壤与君同”、“年来缣帛贱，砧杵万家春”。^③ 又《满庭芳》词云：“丰年，时节好，玉香田舍，酒满渔家。”^④ 又《题灵桥门》诗云：“欢声不厌重城近，霁色遥知秀野丰。”^⑤ 高祐《田园偶兴》云：“绕篱风景接崆峒，生计年年乐岁丰。”^⑥ 这样的颂歌是四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虽然用语不无夸张，但足以昭示甬上确实已经跨入了经济发达、人民相对富足的行列。楼钥也回忆说：“当咸平中，民俗富厚”^⑦，更进一步指出在宋真宗咸平（998—1003）年间奉化即已率先富裕起来了。元祐间（1086—1093）李闳说：“自浙以东，农桑自足，而讼少事简，明最为乐土。”^⑧ 北宋后期知州韦骧也描述说：“况四明之善壤，为三浙之美邦，民饶畎亩之膏腴，地有山川之清胜，冠盖无往来之冗，厨传绝修饰之劳，利烟海之鱼盐，众皆乐止。”^⑨ 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舒亶的说法。试比较一下吴越国时四明的经济状况，施迪说，“方钱氏厚敛其民”，像余姚莫

①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3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76。

③ [宋]舒亶：《和马粹老四明杂诗聊记里俗耳十首》，见《乾道四明图经》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18页。

④ [宋]舒亶：《满庭芳·重阳前席上次元直韵》，《全宋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67页。

⑤ [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8，《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21页。

⑥ [宋]高翥：《菊磴集》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宋]楼钥：《攻媿集》卷74《为赵晦之书〈金刚经口诀〉题其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宋]李闳：《修九经堂记》，见[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9，《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34页。

⑨ [宋]韦骧：《钱塘集》卷9《谢两府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氏那样“独能力田亩以丰资产”者，简直是凤毛麟角。^①尤其是吴越国实行的身丁钱，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嘉靖《宁波府志》卷42《仙释》云：“未几钱氏增丁税，民亡田荒。”袁桷也说：“钱氏以宗亲专节镇，租税刮剥，民不堪奉，昔时故族，躡藉销铄。”^②吴越国纳土归宋之后，宋王朝“从宽典而抚优”，^③四明经济逐渐得到复苏，朝廷也确实采取了一些免课政策，如“尽削钱氏白配之目，官赋顿轻”，^④天禧元年（1017），明州请免濠地及慈溪、鄞县陂湖年课，得到批准；^⑤朝廷还实行了诸如“宽税敛于经典，弛酷榷于糟邱”之类的惠民政策，^⑥加上“陂田越铸农知劝”的自身努力，^⑦这样，四明各县农桑自足，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逐渐成为一方“乐土”。这一时期四明各地均冒出了一批富户，如鄞县富室周氏“珍贿垒积”；^⑧史氏初贫，后“攻苦食淡，铢累寸积，货产寔饶”；^⑨卢氏以“富豪著”；^⑩奉化楼氏“以货雄于乡”；^⑪江口李珂“家饶于财，随所与不校，乃百倍其初”，^⑫不计较投资而能获得百倍的回报，更显示出高超的经营意识；宁海兴修永乐院的麻氏是巨富；^⑬象山林奉元“实巨富之豪者”；^⑭象山刘夔之父“家故饶财”。^⑮有意思的是，这种富裕状态的描述，却较少见于南宋的四明人士中。从吴越国的人民寡富到北宋的

① 俞福海主编：《宁波市志外编》第二辑《碑记选·宋故莫府君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77页。

②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任隐君墓志铭》。

③ [宋]储国秀：《宁海县赋》，光绪《宁海县志》卷20。

④ [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5。

⑤ [清]董沛：《明州系年录》卷3。

⑥ [宋]储国秀：《宁海县赋》，光绪《宁海县志》卷20。

⑦ [宋]宋祁：《景文集》卷14《送史温虞部佐郡四明》。

⑧ 薛家桢：《宁海名人·竭诚为民的北宋政治家罗适》引《宋永嘉县周氏墓志铭》，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⑨ [元]危素：《宋八行先生赠太师追封越国公史公表》，史美露主编《南宋四明史氏·庆传源流》，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⑩ [宋]张邦彦：《宋卢君墓志铭》，见章国庆编注《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⑪ [宋]楼钥：《攻瑰集》卷85《高祖先生事略》。

⑫ [清]光绪《奉化县志》卷23《李珂传》。

⑬ [宋]罗适：《永乐院记》，见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9《寺观门三》，徐三见点校本，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415页。

⑭ [宋]方预：《等慈寺释迦殿记》，见陈汉章等《民国象山县志》卷32。

⑮ [宋]俞观能：《太平禅寺佛殿记》，见《乾道四明图经》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950页。



“民俗富厚”，四明经济尽管还会出现各种波折，但从整体上看，迈开了很大的发展步伐，从而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一节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

唐代中期以来，宁波地区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中心水利工程基本定型，并初现网络化的分布格局，土地垦辟面积不断扩大，传统水利耕作体系也臻于成熟，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时期，宁波的人口增长更快，水利的网络化构建益加完善，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一、兴修水利：内整湖塘，外筑海塘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稍具规模的水利事业，政府的作用和管理机能至为关键。明代有人曾指出：“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① 这说明宋代政府在财力和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积极的支持。北宋曾给两浙路等下诏：“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② 把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规公务，并直接与考课磨勘挂钩，这在制度上保证了地方官对属地水利事业的重视。北宋时期，四明水利工程虽然并未有像唐代它山堰这样的全局性工程，但兴修水利的广度、沟渠浚川的网络化程度，以及产生的社会效益，均远远胜过前代，而人口的快速增长也为大规模兴修水利提供了保证。

宁波地区具有“山一原一海”的南高北低的台阶式特有地形的自然地理条件，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发挥聪明才智，因地制宜，拦山溪以为湖塘，建堤坝以挡潮汐。其中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并以大小河渠构成水网而成农业灌区，其主要的工程设施由堤、闸和堰坝组成，形

① [明]《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十一。

成丘陵平原的灌溉枢纽，以便于调节湖水蓄放。浙东水利建设的这一特点，能发挥出很好的经济效益。然而，由于政治、经济、自然等复杂原因，每一时代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水利建设的种种问题。北宋时期四明水利事业的主要特点是内整湖塘蓄淡，外筑海塘御潮，这自然也是由特定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

（一）内整湖塘

四明人民深知本区农田水利的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旱灾之害而得灌溉之利，并发挥长期的灌溉效益。鄞县令王安石整修农田水利的思想，在当时最具代表性。他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上杜学士言开河书》：“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浚川十百相通……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则连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① 王安石根据鄞县“跨负江海”、“沟渠浚川十百相通”而易于泄水的地理特点，抓住了当地水利的根本症结，指出旱灾是鄞地自然灾害的最主要类型，这与南宋时魏王赵恺“每岁不苦水而苦旱”^② 的说法是一致的。王安石所抓住的其实也是整个四明水利的症结，如宁海“海濒斥卤，旱干无备，三日不雨则田龟拆而枯焦”。^③ 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王安石进而认为，旱灾的发生主要不能怪罪于老天，而是“人力不至”的缘故，所以旱灾实不足畏，应对之道就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动员人民利用农闲季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而无老壮稚少亦皆惩旱之数。”^④ 王安石所提出的“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的应对方略，无疑是整个四明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北宋四明丘陵平原的水利问题，就是如何完善以湖泊为核心的网络化体系，内整湖塘的水利建设，就是为了增强丘陵平原的抗旱排涝的能力，以保障农业的收成。

首先是对主干水利工程的整修，提高蓄水灌溉能力是关键。由于年久失修，宁波的一些主干水利工程损坏严重。如东钱湖泥沙淤积，蓄水

① [宋]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 75。

② [宋] 罗浚：《宝庆四明志》卷 12。

③ [宋] 储国秀：《宁海县赋》，光绪《宁海县志》卷 20。

④ [宋] 王安石：《临川文集》卷 75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量减少，“旱辄连年”。^① 广德湖也因为“唐季坏漏不补，披为田”，^② 不但灌溉能力急剧下降，而且有淤成泽田之虞。它山堰因遭到损坏而“水不入渠”。^③ 这些主干水利工程牵涉面太大，如听任其效益下降而不管，将对明州农业生产造成莫大威胁。于是明州各级地方官吏对这些重点水利工程进行了多次成规模的整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当然，整治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水利活动，还伴随着对豪民占湖为田现象的斗争。

先看东钱湖。宋真宗天禧七年（1017），知州李夷庚开始整治东钱湖，“中有四闸七堰，凡遇旱涸，开闸放水，溉田五十万亩。”^④ 据全祖望《万金湖铭》记载，其时又分东、西两部开拓增广，西湖先成，灌田 5400 顷，东湖后辟，灌田 500 顷，初步解除了东乡农田的水旱之忧。庆历八年（1048），知县王安石又组织民工“重清东钱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⑤ 王安石实施严密的行保伍组织，对于征发劳力进行水利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经过李、王的浚治，东钱湖大大提高了灌溉能力和抗旱能力，“虽大暑旱甚，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⑥ 此后，东钱湖又经过多次整治，嘉祐年间（1056—1063），置莫枝、大堰、钱堰、梅湖等四座硖闸，四硖均筑于基岩上，构建牢固，形式划一，并立水平石于硖边以定放水标准，此为浙江早期水则之一。治平元年（1064），主簿吕献之重修了沿湖的方家塘、高湫塘、梅湖塘、栗木塘、平水堰塘及钱堰塘等 6 条堤塘，全长 2566 米，并于青山岙湖堤旁建嘉泽庙以纪念治湖有功的陆南金、李夷庚。^⑦ 这样，东钱湖在北宋时即已基本建成以四闸七堰为主体的完整水利系统，各堰既是相对独立的子工程，负责一方的农田灌溉，同时又是总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附近诸堰层层沟通，水盛可蓄，旱干则放，东乡百姓深蒙其利。

① [清] 同治《鄞县志》卷 25《王安石传》。

② [宋] 苏舜钦：《苏舜钦集》卷 14《先公墓志铭》，沈文伟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174 页。

③ [清] 雍正《浙江通志》卷 56“它山堰”条。

④ [元] 脱脱等：《宋史》卷 97，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403 页。

⑤ [元] 脱脱等：《宋史》卷 327《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0541 页。

⑥ [宋] 关杞：《李陆二公祠堂记》，见《乾道四明图经》卷 9，《宋元方志丛刊》本第 5 册第 4939 页。

⑦ 浙江省鄞县地方志委员会编《鄞县志》第二十四编第二章，北京：中华书局，第 1272 页 1996 年。

再看广德湖。舒亶有《和马粹老修广德湖》诗说：“七乡十万家，利害寄俄顷。”^①可见广德湖流域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广德湖的兴废涉及西乡约10万人家的利害关系。北宋初，钱亿修整广德湖，调集民工万人。淳化年间邱崇元为之厘正湖界。约天禧七年（1017），“惠民侵冒墾地，太守李夷庚筑大堤以限之。”^②天圣、景祐年间（1023—1037），堤坏，“冒耕者众，请夺滋益繁”，转运使派张大有案视，“得故迹而复之，于是人均其利，而诉牒自息。”^③康定年（1040）主簿曾公望主持治湖。大中祥符三年（1010），知州苏耆看到该湖自唐季以来坏漏严重，“复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无凶年”。^④熙宁元年（1068），鄞令张岫因广德湖久未整治，危及鄞西七乡人民的生存，于是发动当地人民浚湖，历时四个月，增筑环湖堤塘、碶闸、埭等，堤上种植榆树和柳树。如此，鄞西一带的面貌大为改观，“田不病害，舟不病涸，鱼雁茭苇，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而其余及于比县旁州”。^⑤元丰七年（1084），州守马琬登临芜没之地，又对广德湖作了一番整修。^⑥此外，如王安石、虞大宁、段藻等都有功于广德湖的治理。

再看余姚的水利兴修。余姚水利以烛溪湖为主，溉田千余顷，^⑦但堤薄水泄，当地乡民为争夺水资源，经常出现“争讼斗击”的“大狱”，当地的豪族地主莫襄治以石塘，“水既足，民以不争”。他又看到梅川之地高仰，小旱则废耕植，于是“谋浚四旁古河渚水，立斗门以决泛滥，一乡之田遂为沃壤。”^⑧可见莫襄兴修水利，对安定社会、改良灌溉环境，贡献极大。

① [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8，《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909页。

②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6《太常博士张君墓志铭》。

③ [宋]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6《太常博士张君墓志铭》。

④ [宋]苏舜钦：《苏舜钦集》卷14《先公墓志铭》，沈文伟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⑤ [宋]曾巩：《曾巩集》卷19《广德湖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6页。

⑥ [宋]舒亶：《和马粹老修广德湖》诗，见[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8，《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09页。查《乾道四明图经》卷1，北宋年间明州守姓马的只有马琬一人，元丰七年任，马粹老当即其人。

⑦ [宋]施迪：《宋故莫府君墓志铭并序》作“溉田百万顷”，太过夸张，此据《嘉泰会稽志》卷10。

⑧ 童兆良：《检点上林文明·金石篇·宋故莫府君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



这些自唐以来就存在的主干工程，在北宋经浚治后，不仅发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如东钱湖在唐代开掘时仅能灌溉 500 顷，到了北宋天禧年间已能灌溉 5900 顷，扩大了 10.8 倍。广德湖在唐代溉田不过 400 顷，到北宋也能溉田 5500 顷，增加了 12.75 倍。^①

其次，小型的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宁波人民善于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兴修水利。鄞县，熙宁八年（1075）县令虞大宁于北渡创建风棚碶。四明、奉化诸山水至北渡而合，以趋于甬江，当潮来时，从下流遏江水之淡者，以纳于渠，从而达到“却暴流，纳淡潮”的目的。嘉庆二十五年，鄞令郭淳章经实地考察风棚碶故址后，曾赞叹“古人善因势以利导”。^② 鄞县还在熙宁间筑云龙碶截前塘河水，使之上游及中塘河邻湖水域不受卤潮影响。奉化，天禧二年（1081）旱灾严重，县令萧世显凿塘河 2.5 千米，筑“萧公堰”。熙宁年间奉化乡人筑刘大河碶、常浦碶，政和年间又筑大堰、聚堰，溉田甚溥；象山，县令多以兴水利为职责，如任永德“治石碶以御海潮”，郎渭“浚河蓄水，以待旱岁”，治平间县令林旦修治了朝宗等碶，元祐六年（1091）叶授又修筑了石碶；^③ 慈溪在庆历年间浚治了杜湖，嘉祐间慈溪令汪汲疏导了德门乡河，溉废田数千顷；^④ 余姚修治了仇汝湖、新梅湖等诸多水利工程。总之，各类大小不一的水利工程遍及四明，费工小，收效快，极大地提高了灌溉能力和灌溉面积，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水利兴修固然重要，水利管理亦需跟上，这是由浙东沿江分布的陂湖水利的特点所决定的。古代姚江流域分布着众多的仰潮水灌溉的“潮田”。康熙《余姚县志》说：“《湖经》言：有姚江以通灌溉之利，其潮水所不及者，从事于湖，故近江之湖往往而废。不知一月不雨则咸潮立至，龙尾不鸣，夏秋之交，其为一月不雨者多矣，专倚江水，凶年所以叠见也。”这就将姚江流域潮灌的利弊讲得非常清楚。因此，在水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沿江人民对陂湖水利的依赖性更为强烈，“因山为湖以备旱”就显得十分必要。鉴于余姚山泽陂湖纠纷严重，而水资源管

① 乐承耀、徐兆文：《宋代宁波农业的发展及其原因》，《浙江学刊》1990 年第 4 期。

② [清]同治《鄞县志》卷 7《水利下》“风棚碶”条郭淳章记。

③ 陈汉章等：《民国象山县志》卷 21《名宦传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年，第 1192—1194 页。

④ [宋]罗愿：《罗鄂州小集》卷 6《汪推官汲传》。



理制度方面并未有很好的措施，县令谢景初创立了《陂湖规绳》。他责成“诸乡湖水植利人户，具析本湖长阔丈尺、顷亩四至、荫田数目、纵闭时刻，依例置簿，赴县点对”^①。他还立下法规，于每年三至七月，植利人户轮差巡湖，每隔湖塘一里差人户二名看管塘堤、树木、湫堰，一月一替，看管失责，罚钱一贯。谢氏创立的《陂湖规绳》的主要内容是：登录陂湖四至、面积以防盗湖；清丈灌区田地，明确合法业主，进行一定范围的地产登记；约定碇闸的开闭时刻，使水利灌溉有序进行；明确陂湖的受益人与受益人的轮植护修职责。《陂湖规绳》模仿唐代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明确界定了职责权，制定了周密的用水、泄水、蓄水、护水的规章，从而以对水资源利用的制度化约束，来保证各用水业主之间的平衡协调，保证灌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的稳定。它以基簿之记录为凭，经官府“点对”确认，较之白氏之文更具有法律的严肃性，也更具有正式的法规性质。《陂湖规绳》将余姚的陂湖水利纳入了依法管理的轨道，以均衡水资源的利用，杜绝盗湖争利的弊端，并在实施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后世如有涉及余姚陂湖灌区水利纠纷的案件，当事人及主管官署都会根据《湖经》来断案判决。因而此书历代官员多次刻印，嘉泰中知县常褚改名为《古规湖经》。这是四明第一部地方性的水利管理法规，为后来的依法治水提供了成功的范本。它也是国内现知成书最早的湖泊水利管理的正式法规。

北宋四明的水利建设无疑是以地方官为轴心而取得的。不过我们在充分肯定北宋四明官员在水利兴修和管理上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废湖这一逆趋势的存在。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迫切需要获得土地，从而对浙东陂湖的利用更加多样化，北宋浙东的盗湖活动开始加剧。其中余姚的盗湖活动因为《陂湖规绳》的制订而得到有力的遏制，但鄞县的广德湖却最终被废。广德湖大约修筑于齐梁之间，盗湖最早发生于唐代大中元年（847），^②这也是现今可查考到的浙东盗湖之始。北宋时围绕着广德湖的利用问题，出现了民“相率请湖为田”与地方官员禁止盗湖的严重对立现象。但是在北宋末期，广德湖还是最终被迎合

① [清] 光绪《余姚县志》卷8《水利》。

② [宋] 曾巩：《元丰类稿》卷19《广德湖记》。按，[日] 寺地遵：《两宋时期浙东的盗湖问题》（《浙江学刊》1990年第5期第105页）认为：广德湖“盗湖亦即湖田化的活动开始于991年”，此说不确。



朝廷意旨的州守楼异所废。日本学者寺地遵考察了广德湖被废的原因和条件，认为有三点：首先是由于朝廷存在着使其湖田化的强烈意图；其次是由于明州各大族之间环绕湖田问题存在着对立立场和舆论的不统一；第三是地理构造上的原因。^①其中第三点，除了楼异等天真地认为可利用它山堰水系外，清代学者全祖望还考虑到了平原地带陂湖的构造特点，他说：“广德湖三面平坦，堤防尤难，故卒为楼异所塞。”^②虽然，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增多以及政治上的因素等原因，北宋后期广德湖之废几不可避免，但从长远看，广德湖之废对鄞西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无穷的危害，这是后世四明的地方史家最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情。

（二）外筑海塘

四明水利所要面对的另一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应付潮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四明濒海，易受海潮的侵袭，所谓“处处坏堤防，白浪大于马”，^③海潮的危害可想而知。外筑海塘以解除海潮的威胁，并向大海要良田，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期中四明濒海一带水利事业的一个重点，两宋时海塘修筑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均超过了前代。

姚北东起上林、西尽兰风，七乡十八都之地悉濒于海，“诸乡细民生业其中，然海壖鹵脆，潮流溢决，数十里之地为海所渐侵入内地，荡民居，害嘉谷。”^④汉唐以来，姚北因杭州湾海涂北延，垦殖者为防潮患，多于低处修筑土塘，断断续续，分布零散，称作散塘。庆历七年（1047），县令谢景初自云柯（今余姚历山一带）达于上林（今慈溪樟树一带），筑堤2.8万尺，“截然令海水潮汐不得冒其旁田”。^⑤此为姚北第一条后海塘，称为大古塘。其后罗适、牛秘丞又尝试筑石堤，余姚人莫襄也在官府的支持下筑成石堤5000丈。^⑥宣和中汪思温看到姚北60里旧堤“岁久圯坏，民之垫于海者，呻吟相属”，于是修复谢家塘，

① [日] 寺地遵：《两宋时期浙东的盗湖问题》，《浙江学刊》1990年第5期第105页。

② [清] 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卷13《增定广德湖白鹤庙祀典碑》，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97页。

③ [宋] 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5，谢景初：《余姚董役海堤有作》。

④ [清] 光绪《余姚县志》卷8《水利》。

⑤ [清] 雍正《浙江通志》卷63《海塘二》。

⑥ 童兆良：《检点上林文明·金石篇·宋故莫府君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58页。